

薛忠义 著

站立起来的中国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与

毛泽东与站立起来的中国

薛忠义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 薛忠义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站立起来的中国 / 薛忠义著.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5632-1954-4

I. 毛… II. 薛… III. 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029 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大连市凌海路1号 邮编:116026 电话:0411-84728394 传真: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市东晟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幅面尺寸:140 mm × 203 mm 印张:8.75

字数:219千字 印数:1~1000册

责任编辑:黎 为 封面设计:王 艳

定价:19.00元

本书由

大连海事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Foundation
of th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
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 30 周
年**

前 言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毛泽东是站在20世纪中国时代潮流前列的一位伟人,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次巨变使一个百年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国内长期分裂、战乱绵延不息、劳苦大众惨遭剥削与掠夺,被人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完成了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民生活,以及精神风貌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评论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绝不逊色;在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屹立于世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3〕

著 者

2006年5月20日

〔1〕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2〕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3〕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目 录

第一章 遵义会议与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核心的形成	(1)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前奏	(2)
二、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领导集体的一员	(5)
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11)
四、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14)
五、毛泽东何以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25)
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三大难题的破解	(41)
第二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构想	(58)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58)
二、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79)
三、“一化三改”总路线	(85)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	(91)
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98)
第三章 中国社会的局部变迁	(112)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12)
二、抗日根据地	(136)
三、解放区	(160)
四、中国社会第二次巨变的先导	(163)
第四章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66)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	(166)
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80)
三、深刻的社会变革	(187)
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194)
五、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200)

第五章 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	(211)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建立	(211)
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	(222)
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24)
第六章 欣欣向荣的社会风貌	(236)
一、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236)
二、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	(237)
三、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新风尚	(239)
四、大力发展了教育事业	(242)
五、科学技术成果丰硕	(244)
六、文化艺术百花齐放	(248)
七、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252)
八、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253)
九、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255)
结束语 历史的遗憾与启示	(259)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赶超”	(259)
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偏向”	(264)
三、宝贵的启示	(266)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72)

第一章 遵义会议与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核心的形成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党经历了14年的历史,也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等数任领导人,但由于没有形成一代真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党的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和挫折。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发展、稳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只用了14年,其间还经历了八年抗日民族战争。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才使得长征胜利结束,成功地把革命大本营放在了陕北,并适时转变策略方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过八年抗战,我党我军迅速壮大,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解放战争,此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胜利。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绝不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于1935年止于1976年,共存在41年之久。在这41年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为统一独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起步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迈进,可谓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前奏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缺席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蔡和森为宣传部长。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王荷波后补入),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三人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为政治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李维汉、瞿秋白后补入),陈独秀在作了一些检讨后仍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大会选出的仍由陈独秀挂帅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可能实行切实有效的领导,无法扭转愈益恶化的局势。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会。它未能改变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仅存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宣告解体。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罗亦农后补入)。瞿秋白实际上成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就显示了政治活动家、理

论宣传家的才华，同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斗争，在党内享有较高的声望。他在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共领袖，也是一种必然。但是，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无几人能比。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显不足。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白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左”的观点，在革命性质、任务等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中央。他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1928年4月，“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制止后，瞿秋白即赴苏筹备六大，实际上就已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蔡和森任中央宣传部长，杨殷任中央军事部长，苏兆征任中央工委书记，李立三任中央农委书记。瞿秋白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从而结束了他在党内一把手的地位。1928年9月，向忠发率蔡和森、李立三先行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央实权的是蔡和森。11月，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担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不久，能力与声望均在李立三之上的周恩来回国，此后两年来的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都是周恩来主持的，取得了很大成绩。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工作，李立三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展到了顶点。1930年9月24日，由共产国际回国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后，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常委。瞿秋白复出，成为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

领导人。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六届四中全会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全会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补选陈郁、王克全、卢福坦、王明、刘少奇进入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常委。这使得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而向忠发虽仍为主席,但实权完全操纵在王明手里。同年2月,王明被补入常委,更是大权独揽。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统治中央。同年6月,向忠发叛变,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由王明代理。但是,严酷的斗争环境令王明惶惶不可终日,他决心离开上海。同年9月,王明提出了一份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名单,决定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临时政治局,博古、洛甫、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不久,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就形成了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中共中央、博古在国内照王明旨意行事的奇特格局。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央常委),博古负总责。五中全会,标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它使革命事业遭到惨重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才扭转了危局。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导者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体。”〔1〕遵义会议前的14年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形成。这是因为:第一,当时党还处于幼年阶段,选举的领导层也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首先体现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短短时间内,一“右”三“左”共四次错误路线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相继统治中央,全党的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盛行,不甚懂得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第二,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在党内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党的核心领导层十分不稳定。第三,尽管几易最高领导人,但始终没有产生一位在全党具有较高威望、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领袖人物做核心,没能产生一个团结一切优秀分子、凝聚党内健康力量,能领导全党走出困境、走向胜利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尽管如此,这14年间中国共产党毕竟经受了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几番成功,几度失败,党正在摆脱稚气,走向成熟。伟大的革命实践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过程,也是检验领导者是否合格的过程,更是淘汰不合格领导者、塑造和推选新的领导者的过程。在成功与失败的严峻考验面前,一大批党的干部在觉醒、在成长,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部分优秀共产党人在崛起,一代领袖的诞生、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已指日可待。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作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萌芽和前奏。

二、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领导集体的一员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而失利,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率主力红军8万余人踏上了长征路。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面对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红军屡次失利,现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逐渐觉悟到,这是由于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而贯彻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的结果。血的事实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

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还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同志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这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如果再不改变原定计划,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国革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系列失败的原因,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2〕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向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等也尊重和支持毛泽东。这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然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3天热烈讨论，会议还做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

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1〕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总结了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党中央采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其反日反蒋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将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随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

〔1〕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42页。

任。3月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第二次进驻遵义时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罗明回忆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过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1〕

当时，敌军重兵云集贵州，蒋介石亲到贵阳督战，企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周恩来回忆这段经过时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

〔1〕《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70页。